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古代文学研究集



古代文学研究集

余冠英等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2插页 364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355 · 89 定价：3.60元

目 录

“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

- 回顾和探讨·····邓绍基 1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曹道衡 23
鲁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贡献·····范 宁 44
关于古典散文的若干问题·····谭家健 62

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

- 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胡念贻 86
略谈对《诗经》中爱情、婚姻诗
评价的演变·····陆永品 125
中古文学丛考·····沈玉成 傅璇琮 142
建安七子论·····徐公持 186
-

- 论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余冠英 王水照 212
关于诗人魏征的几个问题·····吴庚舜 238
关于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整理的
若干问题·····张锡厚 250

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	乔象钟	287
论“三吏”、“三别”·····	蒋和森	316
略谈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	陈友琴	338
诗坛风尚对李贺诗歌风貌的影响·····	范之麟	353
如何确解李商隐诗		
——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	杨 柳	366
宋代别集拾遗六种		
——《永乐大典》诗文辑佚·····	栾贵明	391
元代后期杂剧的衰微及其原因·····	吕薇芬	417
略谈《荆钗记》的主题思想及		
艺术成就·····	金宁芬	441
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	刘世德	456
一篇一境界 一花一精神		
——《聊斋志异》艺术技巧初探·····	孙一珍	510
《聊斋志异》校、释质疑·····	劳 洪	545
试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		
思想基础·····	白 鸿	561
论《红楼梦》中物的描写·····	陈毓焄	588
后记·····		607

“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 问题的回顾和探讨*

邓绍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这个运动的开初，即文学革命发生前后，没有或者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继承文学传统的问题。在一九二二年以后新文学运动内部发生的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中，却涉及了这个问题。从那时以来，革命文学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在实践上表现出曲折、复杂的情况，从而引出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简略回顾这个历史过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得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正式举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旗帜的文学革命发生得更早，一般认为是

* 本文系作者所写《“五四”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若干问题》的一部分。

在一九一七年。作为这个文学革命发难的重要标志的有两篇著名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诚如一些文学史家所说，陈独秀的态度远比胡适激进。陈独秀文章和胡适文章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他把文学革命看作是政治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必要条件。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早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发表以前，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已经旗帜鲜明地号召兴起一个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青年德意志”运动那样的文学运动。这篇文章显示的文学革命发难者的战斗气势，或者只有《文学革命论》才能和它媲美。自然，李大钊这篇一九一六年发表的文章在当时和后来发生的实际影响并没有《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那样大，没有那样著名。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发难文章，这是确切无疑的历史事实。

《晨钟之使命》提倡新的文学运动时，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学发表较具体的看法。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却有更多的评论，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自汉至宋的全部文学。其间他虽然说“魏晋以下五言”是“文学一大进化”，但他认为它们“是犹贵族之风”；他肯定韩愈、柳宗元“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但同时认为韩愈“文犹师古”“文以载道”的主张，“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按照他提倡的“三大主义”，“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都是要予以推倒的。对宋以后的文学，陈独秀认为“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是“近

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未及出胎，竟尔流产”，因为被“妖魔所厄”。他说马致远、施耐庵和曹雪芹都是“盖代文豪”，但也由于“十八妖魔辈”称霸文坛，使他们的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十八妖魔辈”是指明代前后七子加上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和姚鼐。陈独秀认为他们的作品“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这种看法，主要从文体、语言着眼，如他肯定《国风》、《楚辞》就是由于前者“多里巷猥辞”，后者“盛用土语方物”。但他指责“魏晋以下五言”时说它们的缺点之一是“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批评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是“钞袭孔孟”，却又是从内容出发的。陈独秀的这种评价，既表示了他反对旧文学的勇猛、激烈的革命精神，也表现了一种缺乏科学分析的片面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是有代表性的，当时鼓吹文学革命的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钱玄同和刘半农，一般地也都持这种态度。还有的人走得更远。傅斯年认为中国白话小说除《水浒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外，“其余都是要不得的”。周作人在提倡“人的文学”的时候，把《水浒传》、《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也予以否定，认为全是“非人的文学”。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肯定了比较多的古典作品，但他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却竭力称赞周作人的观点，除了说它“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是一篇平实伟大的宣言”外，还说：“在周作人先生所排斥的十类‘非人的文学’中，有《西游记》、《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等。

这是很可注意的。我们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就这样，胡适终于附和了周作人的意见。

今天，我们读“五四”前后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我们总有这样的感觉：陈独秀、钱玄同等贬低传统文学，主要出自从革命精神出发的偏激；周作人、胡适等却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对古典文学的蔑视，并且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对于“五四”时期一些领导人物贬低、否定传统文学的绝对化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作了十分明白的分析，他说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坏就是一切皆坏，好就是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是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谈这一问题的。“五四”时期一些领导人物的这种缺点的产生有种种原因，应当说是难于避免的，是为具体历史环境所规定的。虽然从全局上说，“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整个运动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因而也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部份。但并不是说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都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五四”运动的前奏的文学革命还是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在那个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刚开始。以陈独秀来说，一般认为他当时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即使认

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物，但也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精神。他对文学遗产所抱的绝对化态度，可以从当时历史具体环境中找到恰当の説明。只要我们不忘记当时的历史情况，只要我们知道那时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占着统治地位，新文化的生长是那样地艰难，那样地受到压制，我们就会对陈独秀等人的矫枉过正的主张作出明达的解释。事实上，陈独秀等人多少是自觉地意识到为了反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才采取了“绝对之是”的战斗态度的。当时胡适和陈独秀有一次通信，胡适认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却认为，当时反对新文学运动，反对白话文的势力“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时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陈独秀反对在攻击旧文化时“装出绅士的腔调”，他支持和同情由于“愤极了”才发出的“激切的议论”。钱玄同也认为他们的主张“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保护旧文学的各种派别各种论点，即使在局部的问题上多少有可取的意见，但整个说来，它们的矛头都是攻击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国故社、学衡派和甲寅派固然是这样，一九二二年以后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提倡的“整理国故”，实际上也是针对新文学运动的^①。正如沈雁冰一九二四年在《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文中所说：“和其他反动运动一样，文

学上的反动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复古’。”沈雁冰的文章实际上又是最早比较全面而具体地分析学衡派、甲寅派和整理国故运动三者相互配合的关系及其恶劣作用的文章。他还说：“我们要站在凶恶的反动潮流前面尽力抵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卫新文学，为了它的生存和发展，当时鲁迅等先驱者进行了坚决的战斗。没有问题，在那些战斗的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十分愤慨的革命感情，同样没有问题，我们也不时可以发现由这种感情带来的偏激的言论。从这样的历史情况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一些领导人物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批评，把这种批评理解为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不应当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人物的指责。无论是一九一七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还是后来的左翼文艺运动，它们都发生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几乎难以避免的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如果文过饰非，乃至把错误当作正确来宣传，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如果不从具体历史条件下去分析那些错误、缺点，而一味指责、嘲笑，乃至罗织罪状，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① 这里和本文第一段都说“一九二二年以后”，是为了区别于胡适在这以前的关于整理国故的言论的政治性质。并不意味着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发生过“整理国故”的争论，如一九一九年“新潮社”和“国故社”就有这个问题的争论，但那不是“新文学运动内部”，而且其影响也不如一九二二年以后的讨论那样大那样深远。

在对待继承民族遗产这个问题上，新文化运动内部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而且又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以胡适退出《新青年》杂志，一九二二年另办《努力》周报、以后又办《读书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正式分化出去。胡适进一步提倡整理国故^①。这决非是为了纠正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出现的对传统文学的轻视，他是出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目的。“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一个主要矛头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中说他创办这个新杂志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里所谓“少说点空话”，实际上就是“少谈些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至于他说他提倡“考据学”的目的“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以防止“被孔丘朱熹牵着

① 这里说“进一步”，是因为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就写过《论国故学》一文。一九一九年北京出现“国故社”及其主办的《国故》杂志，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当时“新潮社”成员毛子水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不指名地批评“近来研究国故的人，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因遭“国故社”人反击，毛子水又发表批驳文章《〈驳新潮：国故与科学的精神〉订误》（见二卷一期《新潮》）。毛文后附胡适致毛信（即《论国故学》）。毛文重点批驳“国故社”，而且怀疑当时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胡适致毛信中却说“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按诸史实，在整理国故问题上，胡适的态度远比“新潮社”中人为积极。同样按诸史实，新潮社中人谈论国故系在“国故社”之后，“国故社”决非是“革新派”。因此所谓“挽救国学”或“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决非是革命的、战斗的口号。

鼻子走”，也防止“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面目。

胡适既然要提倡整理国故，他就要从理论到实践来表现他如何整理国故。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在揭露他的反动目的的同时，也就要提出对整理古代文化的看法。

早在一九一九年，胡适在《论国故学》中提出一个看法：“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这实际上是说研究文化遗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懂得它，同“时势之需”，同发展新文化没有关系。这又同他蔑视我国古代文明，主张“全盘西化”有关，在他看来，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应时势之需”，中国文化是“百事不如人”的。在《论国故学》一文中，胡适还提出了“科学方法”的问题。他认为清朝的“汉学家”用的是“暗合科学的方法”即“不自觉的科学方法”，他自己则要用“自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这里我们暂且不评论清代汉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从胡适的研究工作实践来看，他的“自觉的科学方法”其实是实用主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所谓“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和“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因此，他的研究在个别和局部问题上虽然也取得若干成绩，但当他在全局上立论时却总是表现为唯心主义。当然，更无论他提倡研究国故的反动政治目的了。

针对一九二二年后胡适的整理国故，当时成仿吾发表文章说：“广义上说起来，不论什么事物都可以为研究

的对象，然而研究的人一要有十分的素养，二要取适当的方法。返观现在许多热心国学运动的人，却不仅没有十分的素养，也还未取适当的方法。”（《国学运动的吾见》）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中也说：“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的精神，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成仿吾和郭沫若的意见实际上是批驳了胡适自称的“科学方法”并不合乎科学的精神。成仿吾针对胡适等人的研究工作，还批评说：“若这样的考证便是国学运动的全部，我们倒也不须多说了。”指出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考证不应当是研究文化遗产的全部工作，应当说是成仿吾和郭沫若在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中的很重要的内容。

当时出现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批判“整理国故”的革命文学家，已经不象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时的一些创导者那样一般地排斥和轻视文学遗产。成仿吾说：“国学，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郭沫若也说：“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一样的。”沈雁冰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更明确地说：“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①。而且，“题内应有之事”的提法，较之当时郭沫若说的整理和研究国故只是旧价值的重新估价，並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更富辩证法的观

^① 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一九二一年文学研究会的“简章”中曾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的任务。

点。但沈雁冰同时认为，这“整理旧的”工作是后一代人的事业，不是当务之急，不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他认为那时重要的历史使命还是保卫和发展文学革命的成果。他又认为如果提倡“整理旧的”，就易于为复古派张目，“促成旧势力反攻的局面”。显然，沈雁冰的这个观点是就全局而言的，因此也不是一般地排斥文学遗产的研究。事实上，郭沫若和沈雁冰都是富有古典文学修养的、而且也是比较早地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革命作家。

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来认识，在最初揭露和反对守旧派的整理国故主张时，革命作家中还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理论上的说明，指出继承文学遗产和复古的本质的不同。大致要到一九二八年后，才提出这种明确认识。如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中介绍了野口米次郎关于古代的文化 and 近代的时代精神有继承关系的论点，以及苏联“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后，说：“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也是作为一种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认识，当时揭露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反动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很多文章也都具有这样的内容。但那时整理国故之风却又不只是表现为胡适一人，甚至不只是表现为少数人，如同郭沫若在文章中所描绘的：“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又如沈雁冰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的：“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造成这样的情况又不仅是简单地由于一个

或几个人的提倡的缘故，而是具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所以只是揭露胡适就显得不够了^①。完全否定研究文化遗产的意义，当然不能说服人，就是那种说现在研究“为时过早”的意见也不很有说服力了，这时候很需要因势利导，批驳胡适的反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倡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当时批评整理国故的文章却大抵还是没有这种因势利导的精神。“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即使是后来分裂为资产阶级右翼的人，大抵都说整理国故要用“科学”方法。象成仿吾、郭沫若指出了胡适整理国故方法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但他们提倡的“十分的素养”和“适当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也说得很不了然^②。

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二五年前后，既反对学衡派、甲寅派和整理国故运动，又比较重视文学遗产研究的是鲁迅，他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内，做过研究和整理古文化的工作。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七年，他还在大学里教授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但这时候的鲁迅也并没有从研究方法上深入地批驳胡适，主要也还是从保卫新文学这个角度来加以驳斥。鲁迅这时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在文学史观上，也是这样。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人类的历史

① 一九二三年十四卷一期的《小说月报》开展“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笔谈讨论，不少人指出整理国故之必要性，即为一例。

② 由于这个原因，直到如今还有误解，比如有人认为成仿吾的见解同毛子水、傅斯年的有关观点相“一致”。

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鲁迅的“进化”思想的核心是发展和变革的观点，同时鲁迅的严格的唯物精神表现在治学方法上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在坚持反对封建文化的同时，实际上又是重视并且吸收过去文学的优秀成分。他说他是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国小说中的进步与反动、精华与糟粕这种“反复”“麇杂”现象中讲它们的发展。这种从继承并发扬民族遗产出发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意图，正是“五四”运动若干领导人所缺乏或者不曾明确地提出过的。当然更同分裂新文学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目的、并且实际上是以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胡适的整理国故有着原则的分野。

自然，鲁迅这时候自己所作的整理文艺遗产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到一九二八年以后，鲁迅对待文艺遗产的见解才明显地表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中把“改造中国的旧文学”和“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并提，说打破和廓清传统的落后的文学观念是改造旧文学和建设新文学的前提。虽然他同时又说“中国文学所以虽称极盛，而实则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但从他后来的实践表明，他是很重视“改造旧文学”也就是研究、整理文学遗产工作的。一九二三年他发表《新

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一九二七年他为《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撰写的卷头语中，说传统文学既不都是“这么精莹”，也不都是“有毒的东西”，并不象一块金银两面的盾牌那样简单，“构成的成分更复杂，而且更具有种种迷人的色彩与图案的”。郑振铎的另一篇文章《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提倡“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虽然还没有和胡适的“历史的方法”“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真正划清界限，事实上他还肯定了胡适的考证法，但他和胡适观点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他认为研究文学遗产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大时代”，为了有助于“文艺复兴”。和胡适的中国“文学不如人”的观点截然对立，他还把当时西方文学的传入中国，看作是可以和中国文学“接触”后产生一个大时代的文艺复兴的条件。曾有一种意见认为郑振铎提倡的“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完全相同于胡适的“历史的方法”“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这种意见并不公允。如果说郑振铎的对文学遗产的观点更接近于鲁迅所理解并提倡的“进化论”，倒是比较符合事实。这也可从郑振铎后来很快接受“新的研究方法”得到说明。后文我们要谈到这一点。

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又是比较全面地论述研究文学遗产的文章，它所表现的要求研究传统的宏大气魄，一扫人们常见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鼠目寸光的短钉之风。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篇文章有着一种象征的意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文学遗产的研